

# 歷代駢文名篇注析

譚家健 主編



# 歷代駢文名篇注析

譚家健 主編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書章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

---

264 歷代駢文名篇注析

精裝一冊定價新台幣四一〇元

主編者：譚                    家                    健  
出版者：明            文            書            局  
發行人：李                    潤                    海  
            台北市敦化南路492號  
印製所：凡成印製事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萬大路486巷10弄27號  
發行所：明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字1993號  
地址：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49號7樓  
電話：3619101·3318447·3754679  
郵撥：01436784號 明文書局 傳真：3619101

中華民國八十年五月初版

---

---

Ming Wen Book Co., Ltd.

7F No.49, 1 Sec., Chungking South Road,  
Taipei, Taiwan, R. O. C.

ISBN 957-9509-51-4

## 編 選 說 明

一、本書選錄自漢至清歷代駢文名作五十八篇，企圖向讀者比較系統地介紹駢文發展和演變的大致面貌，比較具體地反映駢文在不同時期的不同特點。對於其繁盛期——南北朝和初盛唐時的作品，固然選錄較多；對於其衰落期——宋以後的作品我們也給以充分注意。四六體駢文固然被視為主要型態；對於非四六體的駢文（如四言體、駢散兼用等等），我們也酌情選錄，以見其多樣性。思想性藝術性統一的作品無疑是入選的首要條件，有些二者未能得兼但在歷史上有相當影響的作品我也給以一定的地位。

二、駢文大多用典繁密，修辭華美，一般讀者閱讀理解不無一定困難。本書注釋，以簡明扼要、通暢易懂為原則。對於生僻的字詞，皆注明音義；人名、地名、典章、制度，皆作必要介紹；典故成語，盡可能講清基本含義并交待出處，一般不抄引出典原文，不作旁徵博引的考證；難句釋意多採用意譯，偶爾也用直譯，兩句以上者有時用串講法解釋。少數費解的片斷還加釋段意。古代駢文作家往往喜歡化用經典舊文，有的舊注也喜歡字字考究其來歷，這樣做對一般讀者并無必要，而且不勝其煩，所以我們只能擇其重要之處作適當的說明，以避免繁瑣。

三、本書所選文章，每篇均有簡要評析，介紹作家生平和寫作背景，評論其思想內容和藝術特點——後者尤其是重點所在。為了便利鑒賞，我們有意收集、引述一些古代評點家的評語。這

些意見，言簡義賅，切中肯綮，往往深得三昧，相信今天的讀者會感到興趣的。由于篇幅有限，本書的分析不可能十分詳盡，也許難以滿足不同文化層次讀者的要求。又由于各篇原作文字難易程度有別，藝術價值不一，因而分析介紹的詳略也不完全一致，而是有所參差和側重，希望讀者鑒諒。

四、本書選目和體例主要由主編負責，注釋和分析主要由各撰稿人負責，全書由主編審閱并統一修改加工，最後由出版社複審。其中有些問題是經過各方面協商確定的，有些問題還來不及仔細交換意見。疏漏、訛誤、不當之處，在所難免，懇請各方面專家和廣大讀者不吝批評指正。在本書選注過程中，曾經參考并吸收了目前已出版的一些選本的成果，尤其是葉幼明、黃鈞、貝遠辰三位的《歷代駢文選》，對我們有不少啓發和借鑒，借此機會謹向他們以及其他有關的作者一并致謝。

## 歷代駢文發展概述

(代前言)

譚家健

駢文，也叫駢體文，是介乎韻文和散文之間的一種文體，以對仗、駢偶、用典和有一定聲律為主要特徵。這種文體在中國文學史上流行了一千多年，出現過不少著名作家和優秀作品。其發展過程大致可以分為如下幾個階段：

### 駢文的萌芽和形成

如果說對偶駢句就是駢文的萌芽，那麼它很早就存在于古代散文和詩歌中了。例如《尚書》中的“滿招損，謙受益”（《禹謨》）。“九州攸同，四隩既宅”（《禹貢》）。《周易》中的“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文言傳》）。《詩經》裡的對句更多，如：“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關雎》），“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谷風》）等等，不勝枚舉。春秋時期的行人辭令和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都常常採用對偶和排比的句式。如《左傳》中的《呂相絕秦》，連用十幾個四言排句。《國語》中的《伍舉論台美》，大量使用駢偶句式。而像《荀子·天論》中的“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飢，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戰國策·趙策》中的“古今易則，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者觀時，而

不觀于時；制兵，而不制于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兵甲之用，不知陰陽之宜。故兵不當于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于事，何俗之不可變？”這些片斷，已經是很整齊的駢文。秦代李斯的《諫逐客書》，駢儷色彩也很濃重。其中從“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日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一直到“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一連幾十句，排比對仗，十分工整。清人李兆洛竟認為是駢文嚆矢，而將其選入《駢體文鈔》。

漢初文章，首推賈、晁。賈誼《過秦論》總結秦朝覆亡的教訓，富于氣勢，長于排比。晁錯《言兵事疏》將中國形勢與匈奴對照，幾乎全是偶句。但二文都還不夠整齊，所以《駢體文鈔》不曾收錄。鄒陽《獄中上梁孝王書》，廣引譬類，與李斯同風，而辭意更形復沓，儼然形成一種儷習，駢體之經脈隱約可尋。西漢中葉，辭賦發達，波及散文，秦疏書信，益趨富贍。如劉向《論起昌陵疏》：“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條災異封事》：“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匡衡《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對仗精細而析理嚴密，後世駢文家（如陸贄）深受其影響。不過，西漢文章中的駢句依然只是偶爾使用，在全篇中并未占主要地位。到了東漢，文風漸趨綺靡，散文中的駢句越來越多，漢末尤甚，蔡邕的作品是其典型。如《郭有道碑》，幾乎通篇皆用駢句，淵雅肅穆，典重茂密，而且音調鏗鏘。如“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游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于是纓綏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像這樣的文章，有人認為已經是純乎為駢文立格了（瞿兌之

《中國駢文概論》)。王闈運所謂“駢儷之文起于東漢”(《湘綺樓論文》)，正是指蔡邕等人的作品而言的。

不過，統觀先秦兩漢文章，對偶均係自然形成，而非有意講求，側重內容之對比，不尚字句之雕琢，風格質直渾厚。除個別外，大多數文章還是以散體為主，或駢散間雜，難以截然劃分的。

建安三國，文風通脫，較之東漢有所不同。內容更加豐富深刻，形式越發自由多樣。如曹操、諸葛亮的文章，基本上不用駢偶，這是當時的主流。與之同時，追求辭藻講究字句的風氣仍然存在。如陳琳的檄文，鋪張揚厲，騁辭使氣，較戰國縱橫家有過之而無不及。其《為袁紹檄豫州》，歷數曹操種種劣跡罪行，使其奸惡面目暴露無遺，讀來令人扼腕。他如曹丕的《與朝歌令吳質書》，是情文并茂的抒情文，“撫今追昔，一往情深，尺幅之中，有無窮感慨”(孫月峰評語)。曹植的表章書信，情采絢爛，才華橫溢。如《求自試表》、《求通親親表》、《與吳質書》，以及吳質的《答東阿王書》、應璩的《與侍郎曹長思書》等，駢儷色彩都很鮮明，實為駢文之先導。但其時風尚，仍是以氣運文，駢散兼馭，既呈現出富瞻勻稱之美，又貫注著疏暢諧婉之氣；既不似東漢之凝重，又未如六朝之輕靡。

到了西晉，駢文才正式成體，其代表人物就是陸機。他有不少文章，整篇都用駢偶，純粹為修辭而使文詞屬對的成分加多，已不僅限于內容的對照。用語力求從古籍中提取，事理的闡述多借助于典故。如《豪士賦序》：“且夫政由寧氏，忠臣所為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爽鞅鞅，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成王不遺嫌吝于懷，宣帝若負芒刺于背，非其然者與？”其中“政由寧氏”“祭則寡人”，摘取《左傳》成語，用衛宣公與寧氏分權故事。“君爽”二句，用周公攝政，召公不悅舊典。“高平”二句，用霍光與漢宣帝故事。整個這段文字說明大臣權重，必然引起君主和同僚的猜嫉。含義深切婉轉，



隸事繁富貼切，句式均為爛熟的四六體，裁對工整，用詞造句，緊緊相對，駢文的主要特徵至此已完全具備。其他如《弔魏武帝文》，評價曹操的功業；《辨亡論》總結東吳滅亡的教訓，仿效賈誼的《過秦論》；《薦戴淵疏》向趙王倫推薦處士戴淵：這些文章都是很成熟的駢文。與陸機齊名的潘岳，長于哀誄，如《馬泝督誄》、《夏侯常侍誄》等，序文中都有一些對句。此外，劉伶的《酒德頌》、李康的《運命論》、江統的《徙戎論》、劉毅的《請罷中正疏》，都是當時著名的文章，都很喜歡採用排比，不過，都不如陸機文章那樣完全駢偶化。

西晉一代文風，總的看來還是散多于駢。尤其章表政論，大都不講藻飾，只求說理達意。然而駢文畢竟已經形成，儘管還是處在襁褓之中。

東晉比之西晉，駢化進程放慢了一些，散文大家以王羲之、陶淵明為巨擘，仍然繼承漢魏遺風，文字以自由灑脫取勝。有的以散體為主（如《蘭亭集序》），有的完全不用駢語（如《桃花源記》）。駢體作品多在應用文字方面，如溫嶠的《讓中山監表》，庾亮的《重與陶侃書》，孫綽的碑銘等等，但影響不如散文大。學術議論文字中有少數也用駢體。如《抱朴子·詰鮑篇》所引的《無君論》，這是一篇聲討君主專制制度的檄文，揭露犀利，行文潑辣，是中國政治思想史上不可多得的傑作。遊記文字有廬山諸道人《遊石門詩序》，這是我國第一篇完整的山水遊記，于細致的寫景中寄寓佛理，同時滲透著遊人的歡悅心情，技巧比《無君論》更為爛熟。總之，兩晉時期的文壇，駢散都在發展，雖然分道揚鑣，但還沒有形成對抗。

## 駢文大盛，獨占文壇

駢文的真正興盛，是在南北朝時期，尤以南朝爲最。

晉宋之際，工整華麗的山水詩代替了平淡無味的玄言詩。與此同時，駢文也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劉宋文章，用典逐漸增多，已達到“殆同書抄”的地步；句子愈益整齊，但散句還是不少。代表作家有顏延之、鮑照等。顏的《三月三日曲水詩序》，全以屬對爲主，已純是四六文字。其《陶征士誄》贊揚陶淵明的高尚情操，是後人研究陶淵明的重要資料。這時的章表詔誥，已通用駢體，書信則尚多散語。像鮑照的《登大雷岸與妹書》，恐怕是我國文學史上以書信作游記的第一篇。文章依次鋪陳東西南北景物特色，顯然受了當時辭賦（例如郭璞的《江賦》）的影響。鮑照的《瓜步山揭文》，借景抒情，充分體現了作者自己的個性。

齊和梁初，由于詩歌中永明體啓發，駢文開始有意講究聲律，這是前代所未有的。這一時期的著名駢文作家作品很多。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以嘲諷的口氣，假托鍾山之神靈，譴責虛偽的隱士，自始至終，對仗工切而且音韻和諧，是傳頌千古的名作。謝朓的《拜中書記室辭隋王箋》，辭意委婉，造語精妙，也很有特色，丘遲的《與陳伯之書》，其中佳句如：“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自然真切，很能勾起鄉思，終于感動叛離祖國的將軍陳伯之，使他幡然悔悟而決意南歸。劉孝標的《廣絕交論》，痛斥人情冷暖，世態炎涼，燭照各種趨炎附勢丑類的靈魂，思想性藝術性都很高。而像劉令嫻的《祭夫徐敬業文》，哀婉淒絕，技巧十分純熟。梁代除家書之外，一般書信已通行駢體，而且出現了一批雋永的山水小簡，如吳均的《與宋元思書》等是。即使學術著作，也有採用駢體的，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劉勰《文心雕龍》即是。後者已設專篇總結駢文的寫作經驗。

梁後期和陳代，駢文進入高潮。梁昭明太子、簡文帝、元帝都是駢文能手。在他們提倡之下，南國文事特盛。這時文章的特點，一是用典激增，以致晦澀；二是四六句型漸成常規；三是雕琢之風大盛。代表作家首推徐陵、庾信，後人稱他們的作品為“徐庾體”。庾信早年生活在梁朝，後來羈留北方。其駢文名作有《哀江南賦序》，這篇文章首先敘述自己在侯景之亂中由金陵逃往江陵以及後來被留在西魏的經過，接著點出作賦的立意，然後反覆陳述梁朝的敗亡和自己被迫出仕異朝的痛苦心情。手法採取夾敘夾議，運用大量歷史典故，曲折而深沉地表達他那無可奈何的思想感情。語言雄健清新，筆勢紆曲轉折，用典含蓄貼當，細膩地體現了難言之隱。他的應酬小簡也多有精品。徐陵的駢文名作是《玉台新詠序》，語言華美，風格纖細，技巧高超，然而其內容主要是描寫宮廷婦女生活，缺乏深刻的社會意義。他的後期作品《與楊愔求還書》反映了對故國的懷戀思念之情，受到人們的好評。在徐、庾以前的駢偶，常見的是上下句相對，且多用四言句。從徐、庾開始，形成以四六句平仄相間作對的新風，這就更加靈變多姿，和諧悅耳了。南朝的後期，駢體的應用範圍還擴大到歷史論文（如何之元《梁典·總論》）和哲學辯論（如傅繹《明道論》）。文筆之分，駢散對立開始出現。駢文被稱為“今文”、“今體”，散文被稱為“古文”（見蕭綱的《與湘東王書》）。駢文中忽視內容，單純追求形式，“爭一韻之奇，競一句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隋書·李諤傳》）等等不良傾向越來越嚴重。批評駢文的意見隨著產生（如裴子野《雕蟲論》）。

十六國時期，北方有些地區（如涼、秦、燕）文化頗高，與南方差別不大。北魏前期，漢化較淺，駢風不暢。遷都洛陽以後，隨著孝文帝提倡漢化，駢文逐漸流行開來。但公文中仍多用散體，著作中則以散駢駢，如酈道元的《水經注》、楊銜之的《洛陽伽

藍記》是。東魏北齊，文人比較集中，吸收南朝文化較多，駢文成就頗高。如祖鴻勳的《與陽休之書》，以退隱山林爲樂，脫離官場爲安，情趣與南朝某些文人并無二致。清人許梈稱贊他：“曠懷雅量，彌率彌真”，“幽峭玲瓏，饒有兩晉風力”（《六朝文絮》）。西魏北周，文化稍遜一籌，雖有幾個駢文作家，都是南朝去的。除前面提到的庾信外，比較重要的還有王褒。其《與周弘讓書》，傾訴對故國的無限思戀而不可能還鄉的哀婉之情，十分動人。與他的朋友陳朝周弘讓的答書堪稱雙璧。駢散之爭也由南朝擴展到北朝。北周統治者宇文泰爲了反對浮華的駢體，曾下令蘇綽仿效《尚書》體寫作公文，并在全國推廣。由于脫離現實太遠，結果行不通。

隋朝統一南北，北齊和陳的一些作家先後來到長安，一時人才濟濟。著名駢文如盧思道的《勞生論》，對當時社會上的不良風氣進行了深刻的批評，是北朝文章的壓卷之作。隋文帝承接北周遺風，繼續清算駢文中的形式主義，曾根據李諤的建議，下令“公私文翰，并宜實錄”。可是同樣沒有收到效果。不久，煬帝即位，文風又恢復到南朝後期。不過，在隋末農民大起義中，卻出現了一些思想上和藝術上都迥異于當時的戰鬥性極強的駢文，如祖君彥的《爲李密檄洛州文》就是。文章列數隋煬帝十大罪狀，真是淋漓盡致。其中名句如：“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經常被後人援用。

初盛唐時期，駢文繼續盛行。

唐太宗開弘文館，集虞世南、許敬宗等十八學士，文風沿襲江左，所作皆絺章繪句。唐初官修各史，論贊悉用駢體。緊接著，出現了所謂“上官體”，代表作家上官儀，詩文均極穠艷，形式上嚴守四六，極少散句，平仄協調，音節和諧，詞藻比“徐庾體”更華美，不過麗而不適，更多甜俗氣。

稍後，出現了著名的“初唐四傑”，他們都是駢文大家，尤

其是王勃、駱賓王。他們的文章和“上官體”有很大不同，內容比較充實，能反映某些社會和人生問題，有一定真情實感，有時甚至憤世嫉俗，慷慨激昂。風格清新，灑脫自如，一反當時迂緩、柔弱、浮誇之風。語言精美，用典貼切，不做作，不堆砌，平仄四六排列整齊，錯綜而有規律，讀起來朗朗上口。他們的名作可以代表中國駢文的最高成就。如王勃的《滕王閣序》，以花團錦簇般的文字，極力描寫滕王閣所在地區的地理位置、歷史勝跡、古今人物和樓台之美、宴會之盛，并即景生情，抒發他自己的抱負和懷才不遇的情緒。文筆生動，意境高雅，結構龐大，層次清晰，前後呼應，似乎一氣呵成。許多名句，傳頌千古，幾乎家喻戶曉。如：“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墮青雲之志”。這些句子，備受當時和後人稱贊。毛澤東曾經指出：“這個人（指王勃）高才博學，為文光昌流麗，反映當時封建盛世社會動態，很可以讀。”駱賓王的名作《討武曌檄》，列舉武則天種種醜惡行為，號召各地起兵勸王。文意簡勁有力，不像陳琳的《為袁紹檄豫州》、祖君彥《為李密檄洛州文》那樣大肆鋪排，而是抓住要害，一針見血；不以用典繁密取勝，而以氣勢磅礴見長。名句如：“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托？”“喑鳴則山岳崩頽，叱 則風雲變色。”“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都具有很大的煽動力。所以連武則天讀後也不得不贊賞他的才華，感嘆宰相失人。像王、駱這樣的駢文，顯然與六朝文大不相同。正如毛澤東所說的：“唐初王勃等人獨創的新駢、活駢，同六朝的舊駢、死駢相差十萬八千里。”（以上均見逢先知《古籍新解，古為今用——記毛澤東讀中國文史書》，載光明日報 1986 年 9 月 7 日）

唐玄宗時，風氣有所變化。《新唐書·文苑傳序》指出：“上好經術，厭雕琢，崇雅黜浮，氣益渾雄，則燕許擅其宗。”“

燕”指燕國公張說，“許”許國公蘇頲。他們都反對華而不實，都是當時駢文大家。張說的碑銘文字，氣象宏闊，典雅壯麗，淡泊中有醇厚意味，自然中有雍容華貴氣象。其表章中有不少佳作，如《請不從靈駕表》，反對唐中宗興師動衆從長安到洛陽去迎接武后靈駕。內容堂堂正正，文字踏踏實實，沒有一點浮詞費語，是盛唐駢文中不可多得者。盛唐時期學術著作也有用駢文寫作的。如劉知幾的《史通》，既是史學巨著，也談到散文和駢文寫作中的許多問題，對浮誇模擬之風多有不滿。盛唐詩人也有不少兼擅駢體，如李白、王維等人即是。

與駢文發展的同時，古文運動已在逐步醞釀。先後提倡者有陳子昂、蕭穎士、獨孤及、李華、梁肅等。他們強調文章必須復古，主要偏重于內容方面的革新，並不否定駢文本身。有的人還寫出了很好的駢文。如李華的《吊古戰場文》就是。作品極力渲染戰爭的殘酷性，反對不義之戰，主張宣文教，施仁義，行王道以統一天下，鞏固邊防。結論是“守在四夷”，即與邊境各國和少數民族和睦相處。此文用典很少，變四六句爲四字句，處處押韻，音節鏗鏘，情文並茂，風格和初、盛唐駢文迥異。說明這時的駢文在內容和形式兩方面都發生了變化。

### 駢散反覆鬥爭時期

駢散之爭，中唐時期達到高潮。由于韓愈、柳宗元等人的努力，散文奪回了失去幾百年的正宗地位，影響比過去擴大了。自韓愈以後，駢文縮小了地盤，僅流行于奏議詔誥，而書信、吊祭、碑傳、著述之屬，多用散體。然而這並不意味著駢文已經退出歷史舞台，其勢力依然是不小的。

與韓愈大體上同時的中唐駢文大家是陸贄。他的文章以奏疏最出色，建言切實，持論篤正，“敷陳論列，無往不可，而又纂

組輝華，宮商協調。則前無古，後無今，宣公（陸贄諡號）一人而已。指事如口講手畫，說理則縷析條分。旁及景物，則興會如騰；遠計邊瑣，則武將森列”（孫梅《四六叢話》）。其名作如《奉天改元大赦制》，是一篇替唐德宗擬的自我檢討。佳句如：“長于深宮中，暗于軍國之務”。“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戍之勞苦。”“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辱于祖宗，下負于黎庶。”“朕實不君，民則何罪？”出入經史而明白曉暢，純任自然而真摯愷切。據說詔書一下，武夫悍卒無不揮淚激發。又如《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向皇帝指出，如果只顧眼前利益，擴大皇帝私庫，勢必財聚民散，自食鼓亂強取的惡果。文章運單成複，用散文手法寫駢文，既保持排比鋪張的特點，又有一種疏朗暢達的新氣象。駢文發展到陸贄，實為一種轉捩點。前乎此者，多詠吟哀思，搖蕩性靈之作。自陸贄移以入奏議詔書之後，駢文不但可以抒情，可以寫景，而且大量用于說理。故駢文形式雖未變，而其性質與內容均已改觀。所以，他的影響在當時和後世與古文家並不相上下，實為宋四六之先聲。蘇軾的秦議就處處效法他。陸贄之後，古文家柳宗元、劉禹錫等也寫作駢文。著名的《陋室銘》就是劉禹錫的傑作。柳宗元為南霽雲所作《唐故特進南公睢陽廟碑》，在當時和後世都受到重視。

晚唐古文運動趨向式微，駢文東山再起。作者很多，集大成者是李商隱。由于他把自己的駢文文集命名為《樊南四六》，于是後世遂稱駢體為“四六文”。李商隱的駢文以書啓為佳，尤善揣摩人情，代人哀則哀，代人諛則諛，用典貼當，無生吞活剝之嫌。“其聲切無一字之聲屈，其抽對無一語之偏枯，手斂而不肆，體超而不空”（《四六叢話》）。在李商隱稍前有令狐楚，長于箋奏制令，《舊唐書》說他是“每一篇成，人皆傳誦”。與李商隱同時的還有溫庭筠、段成式，三人皆擅四六文而又都排行十六，故時人稱其文體為“三十六體”。

北宋初年，文壇承襲晚唐五代，專宗李商隱。作家有楊億、劉筠、錢惟演等所謂“西昆派”，多陳辭濫調，鮮見新意，不切實用。于是歐陽修、蘇軾等又掀起第二次古文運動。由于歐、蘇創作經驗更為豐富，且政治地位優于韓、柳，加上最高治者的支持和配合理學的興起，終于使古文不但奪回而且鞏固地占據了文壇正宗地位。但駢文並沒有消失，只是退居客位而已。歐陽修，蘇軾本人即四六能手，人稱歐蘇“新駢體”。程杲說：“宋自廬陵、眉山，以散行之氣，運對偶之文，在駢體中另出現機杼”（《識孫梅〈四六叢話〉》）。歐陽修痛革西昆末流磔裂怪誕之跡，欲使文體復歸于淳美雅正，故所作駢文多出自胸臆，不肯蹈襲前人，即使熔裁古語，也多出以自然，絕不見牽強之跡。內容漸趨實際，色彩漸趨平淡，清空流轉，紆徐委備，抑揚爽朗，別具風格，從而奠定了宋四六的基礎。蘇軾的駢文，以氣運文，能藏曲折于排蕩之中，用典不多而務必精當，語雖偶出而求其暢達，不事藻飾而愈見莊重，如《貶呂惠卿制》即是。而像《答丁連州朝奉啓》，則流利而婉折，深沉而真切，命意如行雲流水，風格同乎其散文。王安石的駢文，也“純是宋派”，“不甚用典，純以氣行，詞意易于周達”（王菽原《四六精選》）。

南宋時期，社會上大體是駢散並行，有時甚至駢盛于散。著名作家首推汪藻，以及周必大、王安中、洪皓、陸游、范成大等。汪藻的駢文，“文從字順，體質渾然，不見刻劃，如金鐘大鏞，叩之輒應，愈叩而愈無窮”（孫觀《浮溪集原序》）。“敘事精詳，情文委婉，頗足與歐蘇相抗衡”（王菽原《四六精選》）。如《隆祐太后告天下手書》，層次分明，立言得體，氣勢又極悲壯。其中的名句如：“雖舉族有北轅之變，而敷天同左袒之心。”“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羅大經《鶴林玉露》稱贊說：“事詞的切，讀之感動，蓋中興之一助也。”周必大的作品如《岳飛敘復原官制》，也有這樣的



特點。大詩人陸游的駢文，“遣詞命意，尚有北宋典型。故根柢不必其深厚而修潔有餘，波瀾不必其壯闊而尺寸不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南宋末年，民族矛盾嚴重，不少人用駢文寫下了充滿愛國主義的作品，如陸秀夫的《擬景炎皇帝遺詔》，充分體現了艱苦抗戰、至死不屈的民族精神，是一篇情文並茂的新四六。

宋代四六文應用比唐時狹隘，僅流行于詔制表啓之屬。由于古文運動的影響，使得兩宋駢文都有散文化的趨勢。後人概括宋四六的特點是：多用散句、虛字、語氣詞以增強文氣，愛剪裁大段經典文句成語代說己意，經常以闡發議論爲能事，以屬對精巧爲工切，即使虛字也要求對偶，不少人愛用長聯，突破了四六句型的約束。如蘇軾《乞常州居住表》：“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盛，而歸于欲其生；人主之行法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周南仲《追貶秦檜制》：“兵于五材，誰能去之，首弛邊疆之禁；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忍忘君父之仇。”這樣的句子與散文實在沒有多大區別。宣和以後此風尤甚，少數長聯有多達十餘句的，已開後世八股文之先河。

北宋末年，開始出現專門評論駢文的學術著作，如王銍《四六話》、謝伋《四六談塵》等。從南宋開始，“散文”一詞正式流行，也有了評論散文的專著，如陳騏的《文則》、李塗的《文章精義》等是。

## 駢文的衰落和“中興”

元代通俗文學成就較大，詩詞散文尚有可觀者。駢文則率多佻巧，卑冗瑣雜，有獨創性的作品很少。知名作家有郝經、戴表元、虞集、姚燧、袁桷等，不過他們都是首先以散文名家的。元初有一部分宋遺民，繼續用駢文寫作充滿民族思想的作品。如王